

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比喻

年轻干部培养要『精耕细作』

□ 翰 君

2018年7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年轻干部培养，不能搞大水漫灌，更不能任其自然生长，要精耕细作，加强田间管理，及时施肥浇水、修枝剪叶、驱虫防病。”

“种木待成材，聊为十年事。”年轻干部好比一株生机勃勃的嫩苗，要把他们培育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需要组织上付出许多心血和努力。培养选拔年轻干部，事关党的事业薪火相传，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习近平总书记用“田间管理”“施肥浇水”“修枝剪叶”和“驱虫防病”等“精耕细作”的措施比喻对年轻干部的精心培养，指明了具体培养路径，其言谆谆、其情切切，充分表达了对年轻干部的关怀与期望。

以“田间管理”精神优化年轻干部成长环境。种子撒下去并不意味着就能“秋实离离”，如果没有尽心尽责的田间管理，即便播下的是良种，收获的也可能是“稗谷”。年轻干部虽然刚刚迈出人生第一步，但他们有干劲、有闯劲，期待着到火热的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上大展身手。要保护好年轻干部这种干劲头和冲的精神，一方面破除论资排辈、求全责备的错误观念，支持鼓励他们到吃劲岗位上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另一方面在他们成长的关键处、要紧时拉一把、帮一下，就

像帮助禾苗拔除身边抢夺养分的野草、清除土壤中阻碍扎根的砂石那样，及时为年轻干部清除外在不利因素的干扰，让他们在实践中锻炼成长。

以“施肥浇水”理念提升年轻干部能力素质。宋代苏辙在《和子瞻次韵陶渊明劝农诗》中讲道：“粪溉耘耔，乃后有穠。”说明一个朴素的道理：只有养分给足了，禾苗才能破土而出、茁壮生长。正处于落地生根“黄金期”的年轻干部，必须一刻不停地增强本领。在他们所需要补充的“养分”中，“补钙”也就是提升政治能力是第一位的，要突出政治训练，督促年轻干部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同时，结合岗位实际帮助年轻干部提高调查研究、科学决策、改革攻坚、应急处突等专业能力，特别要引导他们把干事热情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学会用战略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历史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来思考和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具体问题，成为本职工作的行家里手。

以“修枝剪叶”情怀聚焦年轻干部呵护关爱。一株幼苗要想长成参天之大材，必须及时为其剪除那些影响其笔直生长的斜生枝叶和杂乱藤蔓。对年轻干部而言，在干扰他们健康成长的因素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容小觑。有的单位深陷文山会海、迎来送往和过度的填表留痕、考核督查之中，年轻干部大量的时间精力被耗费在重复低效的劳动中，无法专注于主责主业，更谈不上学习成长。习近平总书记反复痛陈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危害，强调要把干部干事创业的手脚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桎梏、“套路”中解脱出来。要坚持不懈为年轻干部松绑减负，让其轻装上阵，把最美好的年华和精力用在干事担当、服务群众、推动发展上。

以“驱虫防病”思维加强年轻干部管理监督。《诗经·小雅·大田》记录了古代先民为禾苗驱虫防病的有效做法：“去其螟蠹，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穡。”禾苗的成长需要时时注意驱虫防病，对年轻干部又何尝不是如此。有的年轻干部缺少抵御不良风气侵袭的定力，“前脚刚踏上仕途，后脚就走入歧途”，令人十分痛心。因此，必须坚持严管厚爱并重，把从严管理监督贯穿年轻干部成长全过程。一方面要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他们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守住拒腐防变的底线；另一方面要在日常监督上下功夫，坚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将监督范围从“工作圈”延伸到“生活圈”，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咬耳扯袖，真正育好年轻干部这棵嫩苗，使广大年轻干部切实做到信念坚、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确保党的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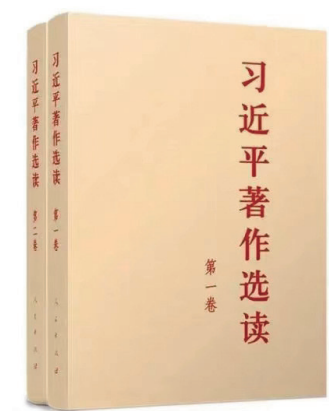
引领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读习近平总书记《正确把握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问题》

□ 刘远立

习近平著作选读

重读经典



《正确把握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问题》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8月19日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讲话的一部分，收录在《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这篇重要文献深刻剖析并强调了卫生健康事业的特殊性和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公益性的重大意义，指出了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供了科学系统的理论指引和实践指导。

坚持问题导向，深刻阐明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总方针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健康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标，健康是1，其他是后面的0，没有1，再多的0也没有意义。”党和政府历来重视人民健康和卫生与健康工作，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健康被放在了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健康中国建

设。2016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吹响了大力推动健康中国建设的号角。紧接着，从2016年10月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到2019年出台《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再到党的二十大，健康中国建设相关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经历了提出核心目标、制定重点行动、聚焦系统工程三个阶段。健康中国建设扎实推进，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阶段性成果。

在这篇重要文献中，习近平总书记首先回顾了不同历史时期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发展变化的历史沿革，并指出，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要同一定时期人民健康需求相适应。例如：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提出“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目的是加快建设卫生防病体系，预防和消除传染病，迅速改善人民体质；在1996年召开的卫生工作大会上，党中央提出了“以农村为重点，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依靠科技与教育，动员全社会参与，为人民健康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卫生工作方针。这些方针在不同时期为推动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在深入分析当前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大势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形势下我国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这一重要论述既有传承，也有创新。“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是对长期以来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做法的坚持和继承。“以基层为重点”，就是根据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和城镇化建设的需要，把以农村为重点扩展到城乡整个基层，增强基层防病治病能力；“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就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力推进卫生与健康

领域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就是从健康影响因素的广泛性、社会性、整体性出发，更加强调政府统筹协调的责任，更加突出依靠群众，调动全社会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新形势下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根本点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为人民健康服务。

持续保障基本医疗卫生事业公益性

卫生与健康工作与其他工作有何不同？习近平总书记从人民的利益和党的性质出发，深刻指出：“人民健康既是民生问题，也是社会政治问题。”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而卫生与健康事业涉及每个人的生命安全和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康，是一项极其崇高也非常特殊的事业。同时，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我们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都要毫不动摇把公益性写在医疗卫生事业的旗帜上，不能走全盘市场化、商业化的路子。

在这篇重要文献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政府投入要重点用于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医疗卫生服务中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应该主要由政府负责保障，全体人民公平获得。在此基础上，政府要不断完善制度、扩展服务、提高质量，让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预防、治疗、康复、健康促进等健康服务。近些年来，我们通过建立健全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特别是医疗救助、疾病应急救助制度），以妇幼、老人、慢病人群为重点实施的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我国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显著增强。

为继续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

就未来如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了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不断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水平。强调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重点是保障人民群众得到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机会，而不是简单的平均化，更不是不要发展。随着经济发展、政府保障能力增强、医疗技术不断提高，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范围可以逐步扩大，服务标准也可以逐步提高。当然，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拓展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内涵和标准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因此，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发展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要同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相适应，不能不切实际作出承诺，把胃口吊得过高。

另一方面，统筹协调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我们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卫生与健康事业，要科学界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第一，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领域，政府要有所为，落实政府领导责任、保障责任、管理责任、监督责任，通过多种方式为人民提供基本医疗服务，支持基础医学研究，同时适当引入竞争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兴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例如：政府可以通过直接提供服务或向社会力量兴办的机构采购服务的方式保证“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全民覆盖。第二，在非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领域，市场要有活力，鼓励社会力量提供服务，满足群众多样化、差异化、个性化健康需求。要放宽准入、拓宽投融资渠道、消除政策障碍，增加医疗卫生资源供给、优化结构。通过统筹协调政府与市场的作用，使得我国卫生与健康工作既有公平又有效率。



“革命工作与学术研究是统一的”

——历史学家刘大年的治学之道

□ 黄仁国

刘大年曾谈到对自己的评价：“我的过去，第一，是革命的一个参加者。抗日战争的发生，受爱国思想支配走上前线，是无数知识分子走过的共同道路。这没有什么可说的。第二，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者、宣传者，通过研究历史宣传马克思主义科学，是职业上的分工。革命工作与学术研究是统一的。”民族精神是他学术工作的主线。

研究学问，关键在人的追求、奋斗

刘大年说：“研究学问和从事革命事业中的任何其他工作一样，要取得相当成绩，环境当然有关，关键在人的追求、奋斗。”他的很多论著，视野开阔，具有极强的跨文化阐释能力，能够在国内外产生重要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这与他不论环境如何变换，都能够坚持阅读、学习，保持博大的胸怀对待学术争论，并在自己的研究中融通各种优秀学术成果密切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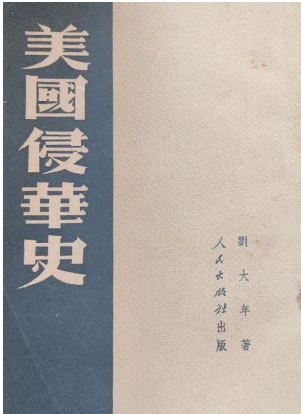
1953年，刘大年开始筹备《历史研究》的创刊，后担任副主编。该刊贯彻了“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历史研究〉的创刊与“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一文中，刘大年在分析毛泽东首先在历史学问题上提出“百家争鸣”方针的背景时说：“郭沫

若和范文澜都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他们对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期，主张不同。他们的书在读者中又都很有影响……古代史争论很大，却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要改变这种情况，需要加强领导，有明确的方针。”他认为“双百方针”是国内政治形势稳定，国内外科学、文化争论的全面、积极的反映。刘大年指出，学术争论的风气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有力推动了学术的发展。

“历史是由人民群众、物质资料生产者决定的”

刘大年史学思想的核心是历史学如何成为科学。他认为历史类比、历史映射根本不是历史学，也不能把历史学当作解释政治任务的工具。刘大年反对“历史不存在一定的客观对象”的极端观点和“凡属过去的一切全部都是历史研究的对象”的空泛主张，并对“历史上某些事物、领域或某种状况是历史研究的对象”等观点进行了辩证分析。他提出，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与一定的生产力相联系的、以生产关系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社会联系及其运动变迁。

1961年，针对“打倒帝王将相”的史学潮流，他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论康熙》，提出：“历史不是由帝王将相决定的，历史是由人民群众、物



刘大年著《美国侵华史》封面

质资料生产者决定的。”用生产力标准肯定康熙的历史地位，用阶级分析方法评论清朝政权的性质。《论康熙》较好地解决了对康熙历史地位的评价问题，也为构建中国自主的清史研究学术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刘大年是较早阐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将会给中国民族文化增添新的活力的历史学家。20世纪80年代，针对一些逐渐弥漫的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的观点，刘大年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它一旦与中国内在根据相结合以后，就成了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年，他在《评近代经学》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

古典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是可以沟通的。”并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是中国文化现阶段的重要发展。”

引领抗日战争史研究成为“显学”

刘大年说：“我们祖国的历史，无论是光荣史还是受侵略、受压迫的苦难史，都是培养人民爱国思想的源泉之一。研究、讲授历史，提高人们的爱国主义觉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这是历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刘大年的论著具有极强的思想穿透力。他有关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大多立足中国社会现实的发展变化。例如针对否定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些议论，他在《说历史的选择》中指出，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取决于任何人的主观愿望，它是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上各个社会阶级、各种社会势力之间长期反复斗争的结果；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转变为社会主义，是历史的选择的继续。

弘扬民族精神，是刘大年从事历史研究的主线。新中国成立后，对于西方侵略中国的历史，刘大年本着“增强科学性”“力求从历史事实出发立论”的态度撰写、修订了《美国侵华史》，成为外国侵华史专著的代表

作，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1982年，日本文部省篡改中学历史教科书，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改写为“进入”，这种歪曲战争性质的行为，让刘大年注意到研究抗日战争史的极端重要性和国内当时对这一段历史研究的严重不足。此后，他倾尽余年几乎所有精力研究抗日战争史。

1989年，针对当时日本首相和法相接二连三地访问天皇开脱战争责任、为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辩解的行径，刘大年作了《日本当局为什么在侵华战争性质问题上倒退？》的发言，强调“日本对中国进行的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这个性质是谁也改变不了的”，这次发言，在国内外产生的积极反响是刘大年后来所说“保持客观性与怀抱爱国主义，绝无矛盾，只有天然一致”的一个非常生动的实例。

刘大年采用政论文体的形式，撰写了有关抗日战争史的许多富有影响力的文章。1996年出版的《抗日战争时代》集合了有关抗日战争的若干论文，反映了他对抗日战争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思考。2000年出版的《我亲历的抗日战争与研究》以亲历者的身份写下了对历史的回忆，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他写回忆录目的不是讲个人，是讲他看到的中国人在那场伟大的民族战争中是怎样走过来的，讲他

们坚韧奋发的民族精神。

1983年12月，胡乔木在视察卢沟桥时，提议要在宛平城修建抗日战争纪念馆，胡乔木嘱咐陪同的相关人员，如果什么事情需要帮忙，可以向刘大年请教。刘大年就有建馆方针、史料征集、展品陈列等问题提出了很多指导性意见，他还给胡乔木写信，提出办好抗日战争纪念馆“是一件关系振奋民族精神的带有关键性的事”，“它和物质建设投资一样，造福子孙后代”。与此同时，他还筹办成立抗日战争史学会和创办《抗日战争研究》杂志，筹划和主持国内国际学术研讨会，引领抗日战争史研究成为“显学”。

刘大年说：“抗日战争中的一切问题，各种题目，细大不捐，中外不论，都在研究讨论之列，没有禁区，更无禁区。”透过研究抗日战争史，刘大年揭示了抗日战争蕴含的民族凝聚力，他强调，“面对强敌，永远竖起一条脊梁，不怕牺牲，为全民族的光荣和后世的光荣理想而奋斗，这就是抗日战争所表现的伟大民族精神”。

